

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的经学成就

金永健

(扬州大学 文学院,江苏 扬州 225002)

摘要:清代经学史上《左传》的考据,经历了由尊汉学而辑存汉儒旧注、批判杜《注》孔《疏》,进而重新建立注疏的过程。洪亮吉的《春秋左传诂》,旨在“存《春秋左传》之古学”,从而搜采古训,匡正杜《注》,补充注解,为《左传》新疏奠定学术基础。这些是其经学成就的具体表现。

关键词:洪亮吉;《春秋左传诂》;经学成就;汉学

中图分类号:B249.9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9)01-0049-05

洪亮吉(1746—1809年),字稚存,号北江居士,江苏阳湖(今武进县)人。早年雅好词章,以诗文知名。青年时期受惠栋、戴震、汪中、邵晋涵、王念孙、章学诚、孙星衍、凌廷堪等经学名家的影响,步入经学领域。他晚年著成的《春秋左传诂》,是荟萃他数十年心力的经学代表作。王先谦续刻《皇清经解》,李慈铭曾建议收取李贻德的《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》,舍弃洪氏的《春秋左传诂》。王先谦未予采纳,于《皇清经解续编》中并收二书。中华书局整理出版《十三经清人注疏》,其中《左传》一经的清人之作,选择的就该书以及刘文淇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。这样的取舍或选择,是对该书经学成就的肯定。该书经学成就具体有哪些,本文就此略作探讨。

一 踵武前贤,羽翼汉学

清初,顾炎武首倡“舍经学无理学”之说,引导学者回归传统儒家经典。他与阎若璩、胡渭等以求实证治学态度,力转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,并共同建立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。乾嘉时期,以惠栋、戴震为学术重镇,以实证考据为基本特征的“汉学”形成,经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中坚。洪亮吉曾说:“迨我国家之兴,而朴学始辈出,顾处士炎武、阎征君若璩

首为之倡,然窳突未尽辟也。乾隆之初,海宇又平已百余年,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,惠征君栋、戴编修震,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。……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,于惠君则读其书,于君(指邵晋涵)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,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,始駸駸然趋实学矣。今之经学昌明,上之自圣天子启之,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,无不可也。”^{[1]192}

洪氏生活在经学昌明、汉学处于鼎盛的乾嘉时期,他推崇顾炎武、阎若璩朴学先贤,尤其推崇惠栋、戴震与邵晋涵等汉学名家。惠栋自述“余家四世传经,咸通古义”^{[2]2803},认为汉儒去古未远,且各有师承家法,从而厌弃宋儒之空虚而学宗汉儒,成为汉学开宗立帜的代表人物,所著《周易述》、《易汉学》、《九经古义》以及《春秋左传补注》,莫不广搜博考汉儒古训以解经释义。其弟子余萧客、江声等人先后羽翼之,流风所被,海内学者无不重通经而知信古^[3]。洪氏激于此风,与王鸣盛、钱大昕等一同转相号召,推波助澜,成为羽翼汉学的中坚力量。

洪氏治学无论旨趣,还是方法,都接踵惠栋。他“采摘群书,第其本末,校正讹漏”^{[4]1143},作《传经表》以考证六经之师承家法;主讲旌德洋山书院,著《春秋十论》以课徒;兼治《春秋》三传,著《春秋三传

收稿日期:2008-06-14

作者简介:金永健(1960—),男,江苏兴化人,讲师,博士研究生。

古义》。他还大量阅读惠栋的著作,并在《春秋左传诂》中多处采用其说。他说:“惠定宇先生以经学名东南,其所著《九经古义》、《易汉学》、《明堂大道录》等,精博有过阎、顾诸君。余昨著《左传诂》一书,采先生之说为多。今又得读《后汉书训纂》,而知先生之史学亦非近时所能及。”^{[5]195}这是洪氏对《春秋左传诂》与惠栋有学术渊源关系的自我表述,而考察其书内容,也显然是一部尊信汉儒、缀次古义、遵循汉学学术理路的《左传》注解。本着复兴汉学的宗旨,他本人在《自序》中宣称:“名为《春秋左传诂》者,‘诂’、‘古’、‘故’字通,欲存《春秋左传》之古学耳。”^{[6]2}所谓“古学”,其实就是汉学。洪氏所宣称的,不仅是《左传》,同时也是乾嘉时期汉学家们考据群经的共同宗旨。为了恢复《左传》汉学原貌,他遵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例,将经与传分开,在体制上重新各自独立,“使之回复到杜预以前的状态,这对于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的好处,却显示了他恢复古学的坚强信念”^{[7]318}。洪氏弟子吕培作《跋》则说:“先生之言曰:‘吾非与杜氏争胜,不过欲复汉儒说经之旧而已。’”^{[8]905}

二 广搜汉儒古训,匡正杜《注》孔《疏》

为清儒所崇尚的两汉,确是一个经学繁荣的时代。据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所列,当时单《春秋左氏》学派就有66人之多。其中著名的,洪氏在自序中列举到的就有陈元、郑众、贾逵、马融、延笃、服虔、彭汪、许淑、颖容等人。在清代汉学家看来,汉儒经解以其近古有家法,最接近于孔门大义。阮元为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作序曰:“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,为其去圣贤最近,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。”^{[9]1}此言指出了两汉之学纯精而无魏晋以降杂糅道、释的原生态特质。正惟尊崇汉学,清代考据学者批判长期以来地位极高的杜《注》以及孔《疏》,广为搜罗汉儒旧说。他们认为杜、孔破坏了《左传》的古学原貌,尤其是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它疏于训诂名物制度而向壁虚造,抄袭汉儒之说而不标注,歪曲《春秋》义理而诬经蔑礼;而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恪守疏不破注,于杜《注》与汉儒相违者,一味曲从杜说。他们立志依据汉儒旧说重新注解儒家经典,建立当代的经传新疏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则是一部在汉学思潮下,旨在追踪汉儒古义、匡正杜《注》孔《疏》、重新注解《左传》的代表作。

洪氏是这样评价杜《注》的:“余少从师受《春秋

左氏传》,即觉杜元凯于训诂、地理之学殊疏。及长,博览汉儒说经诸书,而益觉元凯之注,其望文生义,不臻古训者,十居五六。”^{[6]1}他批评杜预疏于训诂与地理之学,并感叹汉儒经说之师承家法灭亡不存。杜《注》成书后很快在南方流行,与服虔注同立于学官,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北方宗服、南方宗杜的局面。至隋,由于杜《注》盛行,而服虔遂微。唐初孔颖达专取杜《注》而作《五经正义》,更加确立了杜《注》的正统官学地位。杜《注》、孔《疏》盛行已久,成为众多汉儒古注废弃亡佚的客观因素,所谓“自杜预《春秋集解》出,而汉儒训诂失”^{[8]905},也是汉学家们的共识。

洪氏以存“古学”为宗旨,博稽载籍、钩沉索隐、精心搜集汉儒古训及三国《左传》学成果。《五经正义》、《周礼疏》、《仪礼疏》、《公羊疏》、《谷梁疏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史记索隐》,以及《汉书注》、《续汉书注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通典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等,是他发掘与搜罗汉儒旧注的主要文献。他在序中自言,在训诂方面,以贾逵、许慎、郑玄、服虔为主,并广泛搜罗其他汉儒旧注及魏、晋、唐、宋说经诸书所引汉儒之说;地理方面,以班固、应劭、京相璠、司马彪等为主,晋以前其他可信的地理著作,亦斟酌采用。通观全书,洪氏于其他汉儒,如刘歆、郑兴、郑众、王充、王逸、赵岐、马融、郑玄、许淑、颖容、应劭、高诱等,及三国王肃、韦昭等人著述,亦多有称引。

基于广搜汉儒古训,洪氏用了“杜取此”、“杜本此”、“杜同此”三种断语,一一揭示杜《注》的来源。如:

《左传》桓公六年:“公问名于申繻。”《诂》:贾逵云:“申繻,鲁大夫。”(《史记集解》。杜取此。)^{[10]220}

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五年:“请隧,弗许。”《诂》:《说文》:“隧,两阜之间也。”贾逵《周语注》:“阙地通路曰隧。”(杜取此。)^{[10]322-323}

《左传》庄公九年:“遂田于贝丘。”(《史记》作“沛丘”。)《诂》:京相璠曰:“博昌县南近澠水有地名贝丘,在齐城西北四十里。”(《水经注》。杜同此。)^{[10]328}

依洪氏序所言,并细察洪书,揭示杜《注》直接取用贾、服《左传》旧注的,称之为“杜取此”;揭示杜氏利用汉魏诸儒训诂成果的,称之为“杜本此”。“杜取

此”与“杜本此”，大体上都是揭示杜氏采用了前人之说。洪氏还注意到杜氏地理多与同时代的京相璠、司马彪之说相同。京相璠撰有《春秋土地名》三卷，司马彪撰有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。考虑到京相璠、司马彪与杜氏毕竟同时，不能完全断定杜氏是完全采用二人之说，而不是别有来源。因此，遇杜氏与二人说法相同，则称之“杜同此”。现代学者赵伯雄先生注意到了三种断语的细微区别，他认为“这正表明了洪亮吉求实的精神与审慎的态度”，批评沈玉成、刘宁将三者混为一谈，所谓三者是“‘指明杜注承袭前人而不加标明之处’的‘凡例’，是不符合洪氏原意的”^{[11]666}。

在此基础上，洪氏进一步对杜《注》之失予以匡正，对孔《疏》一味“申杜”予以纠驳。其对杜《注》的匡正是多方面的，有词义训诂，有名物制度，也有春秋地理，书中俯拾皆是。特别是在古地理考证方面，其难之处在于地名用字有变化，行政区划有分合，名同地异、名异地同者皆有之。洪氏于史精地理，他说自己“舆地之嗜，几于成癖”^{[12]351}，著有《三国疆域志》、《东晋疆域志》、《十六国疆域志》及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》等。他广采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，并涉及《括地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史地著作，详加考证，不仅辨明杜《注》之来源，且订正颇多，如：

《左传》襄公十八年：“齐侯御诸平阴，堑防门，而守之广里。”《诂》：京相璠曰：“平阴，齐地也，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三十里。”（《水经注》。杜同此，惟云“在县东北”，非。）郦道元云：“平阴城南有长城，东至海，西至济，河道所由，名防门，去平阴三里。齐侯堑防门即此也。其水引济故渎尚存，今防门北有光里。齐人言‘广’音与‘光’同，即《春秋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。”《郡国志》济北：“卢县，有平阴城，有防门，有光里。”按：京相璠亦云：“防门北有光里。”杜《注》殊属臆说。^{[10]543}

同时，洪氏对孔《疏》“申杜”失考提出批评，如：

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：“乃使巫以桃茷先祓禊。”《诂》：《说文》：“茷，芳也。”“芳，菁华也。”按《尔雅》：“菁丑芳。”郑玄注《周礼》曰：“茷，荇帚。”《诗毛传》：“蘼为萑。”“萑荇谓蘼穗也。”据此数者，则茷是萑菁之属无疑。杜

《注》“黍穰”，盖改字从“梨”，用《说文》“梨，黍穰也”。《广雅》亦同。虽有所据，然究不若从本字之训为长。《正义》申杜，又不能推明所自，但云今世若帚或用黍穰。则今世之帚，又有兼用竹者，岂可谓桃、茷是竹，屈古人就我乎？《正义》所说，每游谈无根，不足深论。^{[10]606}

值得一提的是，洪氏在据汉儒古训多处匡正杜《注》、孔《疏》时，偶尔亦能首肯他们的合理之处。这颇能反映洪氏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，也证明了他“非与杜氏争胜，不过欲复汉儒说经之旧而已”的学术初衷^{[8]905}，不似吴派惠氏“凡古必真，凡汉皆好”^{[13]159}。

清儒重视《左传》的汉儒古训，最早可追溯到顾炎武的《左传杜解补正》，但顾氏甚重杜《注》，兼采历代经说，而间引贾、服之义以补正之。惠栋开始指出杜《注》“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，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”^{[14]1}，于所著《春秋左传补注》大量辑引贾、服等汉儒古训以纠正杜《注》，在学界起到极大的引领作用，大批学者相继追踪汉学古义，补正杜氏之失，如马宗珩《春秋左传补注》、张聪咸《左传杜注辨证》、沈钦韩《左氏传补注》，以及臧寿恭《春秋左氏古义》等。而洪氏《春秋左传诂》，以及严蔚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、李貽德《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》，则以辑存贾、服之注为主，且辑存的数量，已大大超过惠栋，而且，“此其义之确而功之伟，视昆山顾氏、长洲惠氏之书，殆有过之矣”^{[15]906}。

三 补充注解，奠基新疏

洪亮吉还从文字校勘、词义训诂、地理考释、名物制度以及史事考证等诸多方面，对《左传》作了补充注释，这是他力图恢复《左传》汉学原貌，进而为建立《左传》新疏所做的学术上的有益积累。

在文字校勘上，洪氏“一一依本经与二传，暨汉唐石经、陆氏《释文》与先儒之说信而可征者，逐件校正，疑者阙之”^{[6]2}。他据以校勘的具体材料很多，不仅比较《左传》刊刻本的异同，还比较“内传”、“外传”、“三传”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的异同，也借鉴吸收了众多先儒之说，从中可以想见其用力之勤。如：

《春秋经二》僖公十六年：“六鵙退飞过宋都。”《诂》：《说文》：“鵙，鸟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六鵙退飞。’”按：今本作“鵙”，《说文》无“鵙”字，当作“鵙”为是。《谷梁》作“鵙”。《刘向

传》、《终军传》亦作“六鷁”。《史记·宋世家》作“陨星如雨,与雨偕下,六鷁退蜚。”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作:“六鷁退飞过我都。”董子《春秋繁露·王道篇》、应劭《风俗通》亦作“六鷁”,皆传写之误。^{[10]55}

这里据《说文》有“鷁”字而无“鷁”字,及所引《春秋传》为“六鷁”,考证《汉书·刘向传》及《终军传》亦作“六鷁”,认为今本作“鷁”,当作“鷁”为是,而《史记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风俗通》作“六鷁”,均为传写之误。阮元《春秋左氏传校勘记》亦取此说。

洪氏于《左传》词义训诂多有心得,如会通“三传”而知古文“昧”、“蔑”相通(《春秋经一》隐公元年)、“袁”、“辕”古字同(《春秋经二》僖公四年),考订“保”古字通用“宝”(《春秋经》庄公六年)。类似的还有“茜,读为缩”;“厉”与“赖”、“郭”与“虢”、“归”与“夔”等,均为同声字,又古字通等,都是洪氏于《左传》通假字的考证发明。

地理考释,则是洪氏专精之处,已如前述,不过于匡正杜失之外,尚有发明补充。至于名物制度、史事考证,则多所创获。如《左传》僖公五年:“宫之奇以其族行,曰:‘虞不腊矣。’”腊为祭名,朱熹谓“秦时始有腊祭”。洪氏乃列举蔡邕《独断》、应劭《风俗通》、《御览》所引旧注、以及《礼记·月令》之说,考明腊祭三代有之,而非始于秦,并以《史记·秦本纪》的有关记载,反诘朱熹。再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: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。”晋文公年几何而出亡?《左传》无明文,《晋世家》言四十三,《晋语》言十七。杜《注》从《晋语》,认为出亡十九年,至即位四年后的城濮之战,则年正四十。有学者又据昭公十三年叔向所言“我先君文公…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”,以佐证《晋语》十七而亡。清初阎若璩《四书释地三续》谓《史记》所言不及《国语》足信。洪氏考据有关史料,肯定《史记》之说,而昭公十三年云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,是谓文公十七岁即能得士,非谓十七岁时出亡。

洪氏还注意吸收当代学者的学术成果,如顾炎武《左传杜解补正》、惠士奇《春秋说》、惠栋《春秋左传补注》与《九经古义》、钱大昕《唐石经考异》等,书中屡有引述,于阎若璩、臧琳、何焯、沈彤、程瑶田、陈树华、桂馥、邵晋涵、王念孙、梁履绳、孔广森、庄述祖、孙星衍等人之说,亦偶加采录,目的也是参酌以证《左传》之“古学”。

在大力辑述汉魏旧说,匡正杜《注》的同时,洪氏往往对旧注古训加以考辨申述,并参酌当代学者之论,时有辨证发明,这就既补充了杜《注》,也增加了《左传》的新注解。因此,《春秋左传诂》是一部汇集汉儒《左传》学遗说的力作,也是一部富有新意的《左传》新注,不仅为后来全面辑佚与恢复汉儒旧注作出学术上的积累,而且为全面建立不同于杜《注》孔《疏》的新注新疏,奠定了基础。稍后于洪氏,李贻德的《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》,专辑汉儒贾、服旧注而详加注疏,它的“编次体裁与太史为近”^{[16]5},太史即指洪氏。李贻德于书中引述洪氏之说,亦屡屡可见。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,乃清代《左传》新疏的集大成之作。刘文淇在《致沈钦韩书》中说:“洪稚存太史《左传诂》一书,于杜氏剿袭贾、服者,条举件系,杜氏已莫能掩其丑,然独苦未全,……窃不自量,思为《左氏疏证》,取《左氏》原文,依次排比,先取贾、服、郑君之注,疏通证明。凡杜氏所排击者,纠正之;所剿袭者,表明之。其袭用韦氏者,亦一一疏记。疏中所载,尊著十取其六。其顾、惠补注,及王怀祖、王伯申、焦理堂诸君子说有可采,咸与登列,皆显其姓氏,以矫元凯、冲远袭取之失。未始下以己意,定其从违。”^{[17]1}按刘氏所云,从著作的体例安排,到疏证的具体方法,以及汇集当代经学名家之说皆标注其名的做法,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洪氏影响的。刘氏非常钦佩沈钦韩的《左传补注》,说自己的书中采用了沈著的十分之六。遍观刘氏《疏证》一书,其所采洪氏之说,数量仅次于沈氏,大大超出其余众家。如《春秋经一》隐公元年:“夏,五月,郑伯克段于鄢。”刘氏疏证曰:

鄢,一作僂,汉陈留郡有僂,即此是(也)。赵匡《集传》:“鄢当作郟,郑地,在缙氏县西南。至十一年乃属周,《左氏》云‘王取郟、刘、蔿、邾之田于郑’是也。”杜《注》:“鄢,颍川鄢陵县。”洪亮吉云:“今考杜《注》既非,赵匡以为作郟,亦无确据。惟应劭之说,最足依据。僂县,前汉属陈留,后汉属梁国,作隰。陈留郡在春秋时大半属郑。且《传》上云‘至于廩延’,杜《注》:‘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。’廩延至隰,既属顺道,又渡河至共亦便,明克段之地为陈留无疑。”按《寰宇记》:“鄢城在宋州柘城县北二十九里。”^{[18]4}

克段之鄢,杜预误以为即成公十六年的“鄢

陵”，属颍川郡；赵匡则以为“鄢”当作“郟”，在缙氏县西南。洪氏援引诸书，考辨汉儒之说，认为“鄢”与“鄢陵”本为两地，应劭所说“鄢”为陈留郡之“僞”为是。前此江永《春秋地理考实》承杜预之误，刘文淇未取江永之说，而取洪氏之说，并据《寰宇记》辨明鄢城的具体位置。

在“复汉儒说经之旧”，“存《春秋左传》之古学”，博考群书，精心搜采散佚已久的汉儒古训，据此逐一揭示杜《注》之来源，并旁证曲引，参酌古今，匡正杜《注》，补充《左传》注解，为清代《左传》新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这些是《春秋左传诂》经学成就的主要方面。正是这些方面，使其成为清代汉学视域下《左传》学的力作和清代经学的名著。

总之，洪亮吉踵武惠栋，所著《春秋左传诂》旨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洪亮吉. 卷施阁文甲集卷九·邵学士家传[M]//洪亮吉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2] 惠栋. 九经古义述首[C]//皇清经解: 第3册. 南京: 江苏凤凰集团出版社, 2005.
- [3] 钱大昕. 惠先生栋传[C]//嘉定钱大昕全集: 第九册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7.
- [4] 洪亮吉. 更生斋文续集卷一. 传经表序[C]//洪亮吉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5] 洪亮吉. 惠定宇先生后汉书训纂序[C]//洪亮吉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6] 洪亮吉. 春秋左传诂序[C]//春秋左传诂: 卷首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7] 沈玉成, 刘宁. 春秋左传学史稿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2.
- [8] 嘉庆十八年吕培跋[C]//春秋左传诂附录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9] 阮元. 国朝汉学师承记序[C]//国朝汉学师承记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10] 洪亮吉. 春秋左传诂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11] 赵伯雄. 春秋学史[M]. 济南: 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[12] 洪亮吉. 卷施阁文乙集卷六·中州金石记后序[M]//洪亮吉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13] 梁启超. 清代学术概论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4.
- [14] 惠栋. 左传补注序[C]//左传补注. 丛书集成初编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1.
- [15] 道光八年吕朝宗后记[C]//春秋左传诂附录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16] 刘毓崧. 李次白先生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后序[C]//通义堂文集卷四. 求恕斋刻本.
- [17] 刘文淇. 致沈钦韩书[C]//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: 附录一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1959.
- [18] 刘文淇.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[M]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1959.

[责任编辑: 李大明]